

一个清廷贵胄的一生

——爱新觉罗·吉兴其人

傅 大 中

吉兴，号培之，辽宁奉天人，姓爱新觉罗，满清皇族出身。

吉兴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本世纪20年代投奔奉系军阀集团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为东北军中将军旅长兼延吉镇守使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率东北军一旅人投敌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汉奸的骂名。伪满建立后，他历任延吉警备司令、吉林警备军司令、第二军管区司令、溥仪的侍从武官长、伪满末期任尚书府大臣。吉兴在伪满军中，是十二个上将之一^①，与张景惠、张海鹏、于芷山、于琛澂齐名为“五将军”。^②

一 借皇荫留学日本

1880（清光绪六）年，吉兴出生在今沈阳的一个满族官僚地主家庭。其时，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蕴酿。吉兴的家族做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，世代饱食皇粮俸禄，封建的家长尽管也领略到了世道的艰危，但仍不愿面对现实，恪守的仍是传统信念，信奉的仍是仕途之道。为使吉兴早日跻身士林，六岁开始为他延师督教，四书五经陪伴他渡过了少年时代的大部份时光。

在吉兴十五岁前后，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场大的震动，这就是甲午战争中国的败北，老大的中华帝国不但败在西洋人的手下，也不堪日本一击，这个事实强烈地震动了中国，在那以后，向西方学习更为朝野各界人士所认同。当时做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措施之一，就是大量引进西方式的学堂，一时读新式学堂，成了社会的时尚。吉兴在这种社会潮流的簇拥下，走出了私塾，进入清廷官学馆学习，后转入盛京官立省学堂。

20世纪初，中国又兴起了出国留学热潮，大批的青年学生涌向西方和日本，清朝统治阶级也鼓吹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制定一系列奖励办法，企图通过学习外国，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。在留学活动中，清朝统治者格外看中军事，而在各国的军事中，又对日本陆军“忠君爱国，服从长官、不侈言民主、不反对政府”的宗旨尤为欣赏，有意通过学习日本的军事制度，改造腐朽的八旗、绿营兵制。但又害怕军事科学知识就此落入人民手中，成为反对它的武器。因此，清廷曾屡次明令禁止自费留学军事，甚至一度想派“世家宦族”、“宗室近亲”、“王公子弟”揽学。

1905年，清政府与日本商定，每年派100名学生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。就此，清政府练兵处正式颁布十六条章程，规定了这批留学生的选拔条件。其中规定：在已设武备学堂的各省旗，由武备学堂选派，未设武备学堂的省旗，从文武世家中选派。并要调查学生的三代、履历。十六条章程还规定奉天省的名额为4名，吉兴不是武备学堂学生，他凭贵族子弟

的特殊身份被选中。

1905年吉兴到日本,先进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基础知识。振武学校是参谋本部为中国人进陆军士官学校专门办的预备学校,因与清政府有协议,故在规束学生思想方面相当严苛,学生入校时,必须填写誓文七条宣誓,吉兴也宣誓:照规专攻学术,决勿稍惑世论干涉政事,以敬上为要道,遵守纪律,以昭敬顺。

三年后吉兴毕业,去日本红之台炮兵十五联队实习一年后,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归国。

20世纪初的留日运动,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深远和巨大的历史意义,留日学生的行为,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,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取向,有的叱咤风云,推动了历史的进步,也有相当一部份人,被日本训化,从崇尚日本而沦为汉奸,这类留日学生为数并不少见,伪满汉奸群中更多,吉兴便是其中之一。

二 投奔奉系集团

吉兴归国后,按去日本时清廷的规矩,他可得到守备,千总级武职出身。^③但这时清廷正刻意编练新军,于是吉兴被派到驻新民的北洋新军二十镇,做了见习军官。不久,辛亥革命爆发,满清被推翻,遂即吉兴的政治生活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

辛亥革命后,吉兴一度失望,但由于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,他的军事专长有了用武之地,民国后他先任奉天督都府编制科一等科员、代理科长,后转奉天镇安上将军公署一等科员。

本世纪20年代,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在东北崛起,有位西方学者在研究奉系集团崛起的历史条件时说过:“那个时期,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官僚说来,除依附于他之外,再也没有其他的职业晋升之路了”。^④吉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投奔了这个集团。1916年张作霖攫取奉天省军政大权后,吉兴出任安东鸭(绿江)、浑(江)两江水上警察局长,升为中校。两年后,执掌北京政权的直皖两系军阀矛盾激化,段祺瑞为拉拢张作霖,策划了“秦皇岛劫械案”,奉系军阀由此得到了大量军火,遂即奉系军阀第一次出关,参加直奉大战,吉兴出任奉军湘东司令部中校参谋兼二十七师参谋长,驻在长沙,开始为军阀混战运筹帷幄。不久转任北平奉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兼二十七师参谋长,升为炮兵上校。

第一次直奉战争后,吉兴又参与了奉系集团兼并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活动。1919年张作霖兼并黑龙江省后,派亲信孙烈臣去督黑,孙带去了大批奉天人亲信拼凑班底,吉兴也随孙去黑省戍边,担任黑龙江省炮兵团长。两年后,张作霖再度兼并吉林,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,吉兴又做为孙烈臣的亲信,随之到吉林,出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,晋升为陆军少将。

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,吉林督军孙烈臣率大部队出关作战,后方留守事宜,吉兴以参谋长的身份全权处理。是时,吉林省境内的土匪乘机四起,由于兵力空虚,一时难以剿灭,在这种情况下,吉兴为尽快稳定后方,使用了剿抚兼用的手段,收抚了土匪四大辮2000余人,然后将其改编为4个大队,经简单训练后,用以讨伐其它匪股。吉兴用此办法,平定了吉林省境的匪患,稳定了后方,赢得了上司的赏识。

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军阀被打败,张作霖率队逃回关外,立誓要雪败战之耻,重新问鼎中原,遂即进行了一系列整军经武的改革,并在关内招揽了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的军官,派充重要岗位。吉兴作为张作霖的幕僚,在这次改革中受命重任,转任延吉镇守使兼吉林步兵

第十三混成旅旅长,被擢升为陆军中将。

当时延吉地区中日关系十分紧张,当地日本领事馆多次被烧,日本人也时有被杀,加之朝鲜民主主义者在此活动,日本帝国主义一直要寻机发难,中国方面在处理延吉中日关系上,一直感到棘手,派吉兴出任延吉镇守使职,实有临危受命之意。

吉兴到任后,将军队沿延(吉)、和(龙)、琿(春)、汪(清)、敦(化)五县驻防,担负国防和治安的双重任务。

两次直奉战争中,吉兴开始发迹,从中校升为中将,逐渐成为了奉系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。

三 伪满汉奸生涯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,又使吉兴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,事变后的第二天,日本驻龙井特务机关长河野某赶到延吉,向他透露了一些事变情况。并试探他对事变的看法。吉兴从他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中意识到,这次事变非同一般,日本既然已经发难,决不会就此善罢干休,因此,他在事变后的几天里,一直心神不安,不做明确表示。不久,熙洽的吉林伪政权,在关东军的刺刀下建立,并给他发来电报,声称吉林独立,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,改副司令长官公署为吉林军政长官公署,并命令吉兴改任延吉镇守使为延吉警备司令,维持延吉地区治安。熙洽的电报无疑是给吉兴下了最后通牒,逼他做出明确选择。接受延吉警备司令一职,就意味着承认吉林伪政权,宣布公开投敌,否则,就有可能成为关东军或朝鲜军越境攻击的目标。在这种情况下,吉兴舍弃了民族利益,权衡了私利认为:“抗日弄不好家破人亡,投降较为有利,自己留学过日本,又会日语”。^⑥于是吉兴决意投降,召来部下3个团长开会商量,会上他先讲了对时局的看法,然后提出投降主张,由于3个团长基本赞成,吉兴顺利地率领这支4800人的东北军更换了旗帜,蜕变成了伪军。

吉兴投降后,使素有复辟野心的清廷后裔熙洽如遇知音,不久,他把吉兴邀去省城,以俩人共是清朝后裔的立场商量建立伪满洲国和推举溥仪的活动,吉兴听说要推溥仪当皇帝慷慨激昂,表示:他与我同宗同族,共为爱新觉罗子孙,他当皇帝我岂有不同意见之理。但他也感到这件事情重大,来得太突然了,心中没底,于是他向熙洽询问7个重大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,即无兵无钱怎么办?国防怎么办?国际上不承认怎么办?张学良回来怎么办?与东北民心相悖怎么办?人民反对怎么办?社会贤达不拥护溥仪怎么办?熙洽很干脆地向他露底,有关东军保护,一切好办。并说:东北富庶,筹款练兵容易,国防上与南次郎有协议,交由日军负责。吉兴听到最关心的国防问题与日本有协议,向熙洽追问内容,熙洽有难色地说:很简单,几句话打个戳。然后扭转话题,示意他加紧做推举溥仪的活动。

吉兴与熙洽密谋后,旋即利用日本留学的关系,遍访了关东军头面人物,在本庄繁、多门二郎、大迫通贞等人面前,为复辟清朝统治游说。

伪满成立后,吉兴因率部投敌有功,被擢升为吉林警备军司令,统辖吉林全省的伪军。1934年伪满改元,吉兴继任第二军管区司令。在这以后的日子里,吉兴以其“卓著”的汉奸才能和汉奸活动,赢得了日寇的赏识,其中最突出的一例,即是他在伪满京畿的吉林地区,连任了9年军管区司令,创下了日寇使用汉奸的奇迹。这期间,随着日伪在东北统治秩序的确立,和日伪统治政策的一系列变化,日寇对汉奸也采用了“宠赐有加,控制使用”的对策,

和吉兴同期投敌的一些汉奸“开国元勋”，多数被褫夺了实权，不是被派充闲职，就是被迫退役，其它的军管区司令，都已数易其人。吉兴能长期受到重用，究其原因，秘密有三：

第一，吉兴是难得的有思想、有谋略的汉奸人才。

在他还是延吉警备司令时，他就开始在日寇面前显露了他的汉奸才能。延吉地处中朝边境，鲜汉民族杂居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当地设置特务机关和领事馆，多次挑起民族纠纷、制造矛盾，积极从事侵华活动。致使该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又使矛盾进一步激化，一时，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揭杆而起，土匪也乘机而起，抢劫绑票蜂拥而至。当时关东军无意进兵延吉，第二师团占领吉林后，主力西调准备攻打齐齐哈尔。面对延吉的局势，关东军为尽快确立该地的统治秩序，曾命令留守部队和铁道守备队进行讨伐。由于情况不熟，关东军对抗日武装和土匪一律采用讨伐对策，但由于延吉山多林密，讨伐经常是兵至匪散，不见成效。吉兴在这个问题上，出手要技高日本军人一筹，他对土匪使用剿抚兼用办法，一面派兵讨伐，一面出示收抚，改编成伪军。吉兴的措施，对土匪起到了分划瓦解作用，对此，他曾得意地说：数日之后，少有效果，稍可维持治安于眉睫。在制止住土匪的活动以后，他又向军事顾问提出根治延吉地区治安的三点长久之策，其一，对抗日武装加紧讨伐；其二，收抚散乱逃兵；其三，严加控制部队，加强整顿训练，防止哗变。由于吉兴的效力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寇大体上控制住了延吉地区的局势。

1932年吉兴升为吉林警备军司令，他又巧施谋略，消灭了殿臣绿林抗日武装。殿臣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活动在吉林境内绿林抗日武装中规模较大的一股，最先起事于辽宁宽甸，后进入吉林的磐石、桦甸地区。一度以永吉县烟筒山为中心，时常出没于吉林郊区，破坏铁路，袭击日伪军，严重地威胁着日伪的吉林统治中心，日伪当局多次予以讨伐，但均建树不大。吉兴则通过各种途径，联络这股绿林武装的内部人，后收买了一个叫刘东坡的头目，以团长职位诱使其率部倒戈，这支武装受到打击后，吉兴又收买人将其首领王殿臣暗杀，彻底瓦解这支抗日武装。

吉兴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在东北的统治过程中，不但有谋略，而且还有思想。

伪满建立初期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达到了高潮，同时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随官长糊里糊涂当上伪军的下级官兵，这时也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们在抗日运动的推动下，也不断以逃亡、哗变的方式进行反抗。这种局面使日伪统治当局十分头痛，吉兴这时谒见日本顾问，献计两条，提出解决伪满初期人民反抗和士兵哗变的具体方法。对人民的激烈武装反抗，吉兴提议用讨伐的办法将其压迫到山中，然后使用“断交通、封锁粮道”的办法，使其日久无粮，不打自散。^⑥吉兴的建议深得日寇的赏识。伪满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规模推行了“集团部落”等法西斯措施，意在分离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，吉兴正是在伪满初期即提供了这一“思想”，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制定镇压人民的政策，提供了依据。

对防范伪军的哗变，吉兴建议在伪满实行日本式的征兵制度，废除中国传统的募兵制，用良家子弟替换兵痞，用军官学校培养的军官，淘汰旧军官，甚至具体地提出淘汰旧军官的办法，采用停年制，以从根本上改造伪军。

第二，吉兴是镇压东北人民抗日运动的“实干家”和日寇的忠实鹰犬。

这有两件具体事例。其一，1935年8月，关东军制定了“十年肃正计划”，^⑦调动日伪军警对奉天、吉林、间岛、安东、滨江5个地区，进行了残酷的军事讨伐和血腥的政治镇压。

这时吉兴刚出任第二军管区司令不久,按理他应指挥全省伪军的讨伐,但他为表现出实干精神,亲临讨伐重点敦化指挥,并在敦化地区推广了他“封锁粮道,断绝交通”的办法,大规模实施集家并户政策,使讨伐队在山区见房就烧,对逃避集家并户的人,一律视嫌疑犯处死。这场讨伐,吉林有敦化、桦甸、磐石、永吉、长春、九台、舒兰、德惠、蛟河十数县受浩劫,以敦化县受害最重,据载,仅该县寒葱岭一带,被当做嫌疑犯杀死的无辜百姓就有百余人。⑧吉兴良知泯灭,残害同胞,换得了日本人的表彰,讨伐后他因功被授以一等大绶旭日章一枚。其二,1939年,日寇从伪满各地又调集大批军警,在吉长警备司令野副昌德的指挥下,对活动在延边、吉林和辽宁东部的抗联一、二路军进行了残酷的讨伐,吉兴在讨伐中,亲手组建了一支挺进队,专门用以捕杀抗联领袖,行前他亲去接见官兵,训示鼓动,让他们不惜一切把杨靖宇的头拿来。

吉兴在伪军管区司令中,以讨伐名将、勤于前线著称,他在9年军管区司令任上,几十次亲临前线指挥讨伐或督战,日寇对他这点十分欣赏,对他的“事迹”也多次在伪满报刊上报导宣扬,每年年终的国务宴会上,他都必受表彰。

第三,吉兴为人乖灵,处事谨慎小心,也是他长期受到日本人重用的一个秘密。

吉兴谙于官场世故,部下常去贿赂他,他都心安理得笑纳,反过来他也会用这种手段去讨日本要人的欢心,据他自己讲:曾送伪军政部高级顾问多田骏古瓷花瓶1对;第二军管区主任顾问中野英光白熊皮1张;广濑师团长法兰瓷瓶1对;第二军管区顾问滨田弘伪币2000元。这些日本人无疑都是决定吉兴命运的关键人物,吉兴的活动,加深了和日本人的感情,对他长期受到重用,起到了作用。

此外,吉兴在伪满期间,一直恪守着“尊口缄默”的宗旨,他汲取一些汉奸的教训,对日本人在伪满的政策,从不加任何评论,他对日本人的用意,既使看清楚了,也隐匿于内心深处,不行见于色。例如,1934年日本陆军动用了4个师团、2个骑兵旅团及空军、机械化部队5万余人,在北海道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,伪满派吉兴为参观团长,领30余名军官去日本参观,吉兴很快就明白日本人的用意是“明为亲善,暗寓威吓”,因此,他在出发前就确定了一味逢承的宗旨,在整个访日期间,日本人制造了浓厚的日满亲善气氛,安排他发表看法,但他紧闭内心世界,逢场便讲:满洲国是日本缔造,对日本要念念不忘。他的内心秘密,甚至与心腹部下交谈时也不流露。吉兴的这段心里秘密,直到他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,才公开说了出来。

伪满期间,关东宪兵队曾通过收买汉奸高官身旁的人,秘密监视他们的言行,吉兴由于处事谨慎小心,在日本人眼中,一直留下了一个忠顺可靠的形象。

1941年春,吉兴被调离第二军管区,转任侍从武官长,做为溥仪的最高军事谘议官,终日陪伴着溥仪。侍从武官长实际上是闲职,没什么具体事务。据吉兴自己讲,他任侍从武官长期间,只有两件事还算得上工作,一是在有人朝贺时,侍从武官长侍于溥仪身旁,行站班礼仪;二是每年岁末,例行公事,代溥仪向各地赐慰劳品。

1944年吉兴转任伪尚书府大臣。从武官转任文官,名义上是因特殊功勋擢升,实际上是请他脱离军界。按伪满规定,尚书府仅是溥仪的一个办事机构,人员不过10名,日常工作主要是保管玉玺。吉兴做为大臣的具体工作是监督诏书、叙勋证书、任命状及伪满法令、章程的

(下转232页)

立”，无疑是王机谿死后，摆银答里与父辈人物权力纷争所致。而这种权力争斗，绝不会仅仅局限在摆银答里与其亲叔之间。不可排除摆银答里与其堂叔之间，也存在着这种极为激烈的斗争。因此不能简单的认定摆银答里所杀的七个叔叔，都是摆银答里的亲叔叔。也就是说，用“摆银答里杀其叔七人而自立”为据，论证王机谿至少有八个儿子，难以令人信服。据笔者考索，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镶红旗瑚锡布条下明载：“王机谿（即汪加奴）第八子也”^⑥，言之凿凿。笔者认为，这才是论证王机谿至少有八个儿子的根据。

其六，从文所列世系表，各辈横向之间书写所例前后不一。辉发部第二代流陈与背陈、第三代纳灵刚与耐呼顽，列表时采用现今满族谱谍的左书右写法。即兄流陈书于左，弟背陈书于右。兄纳灵刚书于左，弟耐呼顽书于右。而对第九代摆银答里一辈兄弟诸人，则依解放前满族谱谍的书写体例，右书左写。如通贵为兄书于弟巴丹泰之右。笔者认为，同一世系中各辈书写体例应划一。

其七，察阿奴死亡年代从文亦失之粗疏。从文称：“成化元年（1465）十二月，明廷赐察察阿奴，

察阿奴约即死于年”。据笔者考索，《明实录》有载：“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二月壬午，弗提卫都督察阿奴奏，欲进海青。……此等野禽，能令人荡心于畋猎，岂宜受献，有司其即却之”。^⑦“成化元年十二月癸未，赐弗提卫故都督察阿奴祭。初察阿奴来朝贡卒于道，至是考郎兀卫都督哥哈成等以祭请，故赐之”^⑧。上引二段史料，确切地证明了察阿奴成化元年二月时尚在，且有进京朝贡之请，但未获准。后来获准进京朝贡，岂料死于途中，时在成化元年二月至成化元年十二月之间，史料凿凿，勿庸置疑。

为探索辉发部世系，以便进一步理清辉发部兴衰轨迹，为研究海西女真史及东北史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，笔者作了以上考索，诚望从佩远同志及同道赐教。

注：

- ① 《全边略记》卷十·辽东略
- ② 《明英宗实录》正统六年
- ③⑥ 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卷二十四
- ④⑤ 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卷一
- ⑦⑧ 《明宪宗实录》成化元年二月壬午

（上接244页）

用印，月终列表统计用印，向溥仪报告。

1945年前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，彻底失败的迹象已经显露。为强化对东北这个兵站基地的控制，日寇把天照大神从日本搬到了东北，在东北各地修建了一些日本式的神社，试图从强化思想统治入手，牢牢掌握住东北。在日本投降前的一年里，吉兴陪伴着溥仪，每天上午在宫内府聆听日本的神博士讲天照大神，吉兴和溥仪毕恭毕敬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飞机袭击长春，吉兴等一批伪满高官才知道日苏已经开战。8月13日，他在伪满即将垮台的慌乱中，从伪中央银行掠得3万元现金和20万元支票（因苏军占领长春，未及提出），随溥仪逃到了临江县大栗子沟，准备携同日寇负隅顽抗。日本宣布投降后，8月19日古海忠之从长春赶到大栗子沟，召开重臣会议宣布溥仪退位。吉兴向溥仪施完君臣大礼后只身逃回长春，8月31日被苏联红军在其家中逮捕，押往苏联。1950年吉兴被遣返回国，羁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，1954年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。

注：

- ① 另外11个上将是张景惠、张海鹏、张文铸、于琛、于芷山、王之佑、王静修、王殿忠、邢士廉、郭恩霖、乌尔金。
- ② “将军”是伪满的终身官，在所谓功绩卓著的上将中拔擢。另伪满规定，文武官一般不能相互兼职。但有“将军”称号者例外，可兼文职。
- ③ 清廷练兵处章程规定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，

归国后成绩优者授守备，次者授千总，再次授把总，并以此武职做为其出身。

- ④ 《张作霖在东北》（英）加文·麦克马克著，毕万闻译，14页。
- ⑤ 吉兴笔供：1954年4月20日。
- ⑥ 吉兴笔供：1954年12月5日。
- ⑦ 即昭和10年，1935年。
- ⑧ 古海忠之笔供：1954年7月20日。